

文章作者是谁可能都搞不清楚,只能就文本解读文本。作为报纸杂志,它的最现实的最终的最重要的成果也是文本。因此,文本解读是第一位的,是报刊杂志研究的主体。文本解读有其缺陷,如果不能把它和其他解读结合起来,就无法把报刊杂志研究透。标准的解读是把四种解读结合起来的解读。也许还有更多的解读方式,但如果没有条件把四种解读很好地结合起来,文本解读至少可以把报刊杂志的基本内容分析清楚。

新闻传播是新闻史、报刊史研究必须注意的基本线索,但是,也可以拓展研究的空间,使新闻史、报刊史研究具有更多的跨学科的价值。比如,有一些报纸不仅拥有新闻媒介的价值,还拥有非常丰富的思想和学术积累,专门从学术史意义上研究它,就是一个需要给予注意的视角。比如,关于新闻史的研究,对特定时期新闻报刊的人才策略、营销策略、公关策略、管理策略的研究,也是不可忽视的内容。比如,围绕新闻事业的发展,新闻界和其他文化行业所衍生出来的文化生态,相关族群的生活、思想方式,以及由此所构成的特定的社会阶层和社会公共空间,也是新闻史、报刊史研究应该加以注意的内容。

对一些著名报刊的研究,必须给予相当的重视。有一些刊物所积累的文化资源,远远超出了运用目前一般报刊史研究方法所能够评价的水平。也就是说,它的极大的新闻含量、知识含量、思想含量,使它成为相对时期最重要的文化载体之一,成为特定条件下文化转型的重要时代元素之一,成为该时期社会生活现代性的标志性事物之一。实际上,要在中国近代整体历史背景下,在新文化生长点的崇高地位上,才能够恰当地评估它的价值。

比如《东方杂志》,已经成为学术界的一个研究热点。这份杂志,是近代中国历时最长、容量

最大、影响最巨,集时事、文化、思想、学术于一体的综合性民营期刊。至少在以下四个方面,它给我们留下了广阔的思想空间:第一,它是近代出版史上十分出色的大型民间刊物;第二,它是近代中西文化交汇期间知识界学习讨论的公共平台;第三,它是近代中国文化转型期间传播新经济、新文化、新科学知识的公共窗口;第四,它是近代民间资本成功经营文化产业的一个范例。

据有关专家统计,在1904~1948年的45年中,《东方杂志》出版44卷819号,共约发表各类作品20 000余篇,其中文艺类作品1000余篇,包括小说和翻译作品900余篇。仅仅1932~1938年的7年中,在《东方杂志》发表作品的作者就有1344人次。

所以说《东方杂志》是现代文化的生长点,是说它提供给社会的知识有现代性,在推动近代社会转型方面有影响,在近代以来文化事业发展史上有地位,在经营管理上提供了现代企业经验,在长期发展过程中发挥了培养人才的作用,等等。

应该承认,近代新闻史、报刊史、出版史的研究,都取得了很大的成就。目前,迫切需要转换研究方法,采取个案化的路径,对各种报刊分别做全面的清理。在这里,特别应该鼓励和支持年轻学者进行的创造性工作。我相信,我的学生杨永兴对当代《红旗》杂志的研究,陶海洋对《东方杂志》的研究,皮学军对“文革”前《光明日报》的研究,一定能够做出新的成绩,达到新的水平。

总之,新闻史、报刊史研究任重道远,我们应该加倍努力。

收稿日期 2010—09—20

作者李良玉,历史学博士,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江苏,南京,210093。

实证功夫与多重视角

朱从兵

中国近代社会的重大变化之一就是社会舆论的逐步开放,包括报刊在内的各种大众传播媒介从无到有,在挫折中不断得到发展。近代报刊

为人们研究社会历史提供了最为丰富的第一手史料,其本身的运作也反映了社会历史发展的诸多方面,因此,透过报刊所能看到的社会历史,不

局限于报刊页面的呈现,更深刻的内容还隐藏在页面背后或页面之外。从这个意义上说,安徽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成立中国报刊与社会历史研究所是独具慧眼的,在王天根教授的努力下,该所以近代报刊与社会历史为主题连续召开了两届学术研讨会,并在《安徽大学学报》开辟相应的专栏,也是深具学术用心的,为推进中国近代报刊史研究的深化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也创造了难得的契机和交流的平台。

如何深化对中国近代报刊史的研究?新闻史学界和中国近代史学界都非常关注,但学者们试图划分出两个学科的边界,设想在自己的学科边界内从事报刊史研究,这种努力无可非议。但是,无论哪个学科的学者,要想推进中国近代报刊史的研究,应有一些共通的基本方法,或应有共同遵循的基本原则。唯其如此,学术研究中的跨学科群体攻关才成为可能。笔者以为,将对近代报刊页面的研读和对页外的解读结合起来是深化报刊史研究的一个基本方法。页面研读要有实证功夫,而页外解读则要有多重视角。这正是深化报刊史研究应遵循的基本原则。

页面研读的任务是要全面、深入、细致地了解报刊,也就是说,研究者要通过认真、细致、逐页地研讨报刊页面,认识和了解所要研究的报刊是一个什么样的报刊,处于什么样的状态。其存续时间、出版周期和每期信息容量,版面大小及栏目安排,内容的构成、比例和来源,作者或记者群体的偏好与文风等报刊基本指数,都需要研究者亲自接触到报刊并逐页地研读,才能准确地把握。把握了这些指数,研究者就有可能从整体上了解报刊的个性特点即其独特的风格、宗旨和理念,从而对所研究的报刊,从感性的认识上升到初步的理性认识。对报刊页面的研读需要有实证的功夫,研读越是仔细、越是扎实,对报刊内容进行翔实的、系统的归类和分析也就越有可能,对报刊的了解和认识也就越准确、越可靠,后续研究才会有一个更坚实的基础。因此,页面研读是对所有的报刊史研究者的基本要求,无论是哪个学科的研究者,如果不在页面研读上下功夫,不对报刊有一个基本的了解,那么,他对报刊史的研究是不可能得出令人信服的看法的。

但是,只有页面研读是不够的。因为人们研究报刊史不只是一要认识近代报刊的基本情况,还需要进一步认识和研究为什么在当时当地有这

样的报刊,为什么这样的报刊是这样的个性特点。也就是说,我们的研究目的不只是知其然,还要知其所以然。这就迫切地需要进行页外解读,页外解读要求研究者不能再将眼光局限在报刊页面的呈现,而要有多重视角去揭示隐藏在报刊页面之后的更为深刻的内容。通俗地说,研究报刊不能只见报刊,不见报人,不见社会,不见其他的报刊和媒介,否则,研究者的视野就显得过于狭窄。

页外解读的多重视角是要求研究者能够从报人与报刊、报刊与社会、报刊与报刊和其他媒介的相互关系的角度去解读报刊。一个最基本的道理是,报刊是由报人创办和运行的,报人的思想、社会关系、政治的或社会的地位、经济实力对报刊是有影响的。报人的思想和理想有可能就体现在报刊的宗旨中,但是,他的思想和理想是否完全能够得到体现,还得将报人作为一个群体来研究,报刊的最终宗旨往往是报人群体内部各种思想博弈的结果。报刊的周期及其容量大小也反映了报人能量的大小,报人的经济状况是一个重要的因素。在有些情况下,虽然报人的经济状况也许不够强,但其广泛的社会关系和崇高的社会地位,使他能够筹集到足够的资金维持大容量和短周期报刊的良性运转。与此相应的可能性是,得到社会关系资助的报刊在其宗旨方面就会或多或少地受到影响。因此,通过页面研读所能了解的报刊宗旨与报人领袖的思想之间有可能存在着差异,解读这种差异,若从报人与报刊的相互关系的视角切入或许会有所裨益。

报人是在一定的社会背景和环境创办和运行报刊的,报刊对社会的运行和发展是有影响的,而社会的方方面面面对报刊的创办和运行也是有所制约的,这是研究者在进行页外解读时应该注意的一个视角。报刊与社会的相互关系,有一些较为基础性的内容。报刊的宗旨、经营的理念、报刊呈现的策略及其发行规模决定着其对社会的影响程度,这是研究者应该注意的一个最基本的问题。社会对报刊的影响有时则更为直接地以受众为桥梁,受众对报刊的反应,报刊对受众反应的反馈,则成为报刊与社会互动的鲜活样板,因此,在进行页外解读时,加强对报刊受众的研究,也应该成为一项重要的内容。报刊与社会的关系,还有一个方面更能说明问题,那就是:报刊所呈现的社会面貌或社会变迁的进程与实际

的社会面貌或社会变迁进程是否存在着差异,如果存在着差异,其原因何在?从小处看,可能是报人的思想、理想使然;从大处看,则可能是报刊与社会利益群体的博弈结果,显示出报刊与社会更为深层的关系。总之,报刊与社会的互动关系,可能有多种形式和方面。笔者以为,社会塑造报刊,报刊改造社会,应该是一个基本的或占主流的状态。社会的背景、环境和需要决定了报刊的基本走向和基本格调,而报刊的宗旨、理念及传输的价值观都在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改变着社会。这里的辩证法是,受社会塑造过多的报刊,对改造社会的贡献也许就较小;而受社会塑造较小的报刊,往往成为社会发展的指示明灯,对改造社会的贡献可能就大些。

报刊影响社会,报刊改造社会,并非是哪一种报刊独力之功,整个的大众传播媒介系统都在发挥作用,甚至有些报刊是通过其他的报刊或媒介而发挥作用的。因此,我们研究报刊史,不能只孤立地研究一种报刊。即便我们重点研究某一种报刊,也必须运用比较的方法或联系的观点去考察该报刊与其他报刊或媒介的关系,通过比较,该报刊的作用才会有更准确的定位,而其特色也才更能得到彰显。事实上,社会思潮和社会舆论的建构或形成往往是多种报刊或媒介共同努力或者是相互博弈的结果,每种报刊或媒介都在其中扮演不同的角色,每种角色都有特定的历史作用,而且,这种角色都对每一种报刊或媒介的生存、发展有着相当大的决定作用。在社会舆论的建构中,有些报刊的主张出自报人真诚的思想信仰,有些报刊的主张则是出于生存的需要来争夺媒介市场,而有些报刊的主张则可能是摇摆不定的墙头草。因此,将某种报刊与其他报刊或媒介联系起来,有利于全面再现社会舆论构建的历史场景,在这个场景中该报刊的历史定位也更容易找到。

研究者从报人与报刊、报刊与社会、报刊与报刊或其他媒介的相互关系等视角去研究报刊时,还要考虑到报刊类型、区域差异和时间维度三个因素。各种类型的媒介既有共同的运行规律,也有各自独特的运行规律,就此而言,报刊的类型值得注意。不同类型的报刊,有不同的报刊呈现手段和策略,主办的宗旨和目的也各异其趣,报人的社会关系和社会利益大不相同,受众也各有不同的人群和规模,因此,不同类型的报

刊有自身的运行规律,其对社会的影响也各有独特之处。研究者准确判断或充分注意所研究的报刊的类型归属,就显得非常必要。区域差异不只是空间差异,更重要的是区域文化的差异和权力控制的差异。不同区域的报刊会显示出不同的风格,面向不同区域的受众,报刊会采取不同的呈现策略或手段,其根据亦在区域性的文化背景、民俗心理和权力控制的特点。从媒介总体的区域布局来看,不同区域的媒介可能会有不同的功能定位,不同的功能定位会决定媒介内容的差异,从而使不同区域的媒介呈现不同的风格。由此看来,研究者了解报刊所在地及其受众所在地的风土人情、民俗心理、权力结构也是很有必要的。报刊的时间维度有以下几点是需要注意的:第一,创办的时代背景,一个时代需要一个时代的报刊,一个时代的报刊有一个时代的特色和印记,这个时代背景在某种程度上决定了报刊的宗旨或创办目的。第二,报刊的存续时间长短,一般来说,存续时间较长的报刊才能形成较为稳定的风格,存续时间较短的报刊不易形成其个性风格,而且存续时间的长短也颇能说明报人稳定的社会关系和事业追求的毅力、传承性。第三,出版的周期时间,如果出版的周期较短,而又有较大的信息容量,那么,报人内部的组织程度必定较高,有较高的工作效率,体现了较高的管理水平。如果出版周期较长,那么报人有较为充分的时间组织信息,加强栏目策划,内容的深度较有保障。第四,要注意到报刊自身变化的阶段性,报刊在不同的阶段可能有不同的特点,也就是说,要用变化的观点和发展的观点去考察报刊运行的过程,有些报刊在存续期间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往往有多次的变化,这种变化,不但会体现在栏目和版面安排的变化,而且有可能是报刊宗旨和目的的变化,这些变化使报刊自身的运行呈现出若干阶段。研究者注意到报刊的阶段性,就能更为准确地把握报刊与社会的关系,更能挖掘报人思想和理念的转变,甚至还有可能揭示出报人内部或报人与社会关系的各种利益博弈的演变。由于时间和精力限制,有些研究者重点探讨某种报刊某一阶段的历史,在方法论上是可行的。从该报刊的整体历史进程和发展趋势来把握其某一阶段的特征,切忌以偏赅全,则是研究者应该注意的。

研究者以多重视角研究报刊史,有的会运用

各学科的理论。笔者以为,理论的运用是必需的,问题是如何运用理论。这个问题具体到中国近代报刊史研究,就是要处理好一个老生常谈的问题,即理论与史料的结合。当然,这里的前提是要求研究者对所运用的理论有一个充分和全面的理解,要通过研读其主要的代表性原著掌握这种理论的基本原理和主要观点,了解这种理论的各种预设、时代背景、适用范围和条件及其内在的逻辑缺陷,最重要的是把握这种理论的精髓和灵魂,即其基本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唯其如此,我们才能确定这种理论运用于报刊史研究的意义之所在。有些理论揭示了事物发展的一般规律,但是,有些理论所揭示的规律或现象仅限于特定的时空,并不具有普遍的适用性,运用这样的理论来研究中国近代报刊史就是不适当的,因此,确定理论的适用性是运用理论的第一步。运用理论来研究中国近代报刊史,可以先有观点,再找史料论证,也可以根据理论的基本思路先找史料,通过研究再得出观点。先有观点的研究,实际上是一种“证实”的研究,这里的关键在于对史料有丰富、全面和可靠的掌握。如果建立在这个基础上,对既有理论观点的证实是学术研究所需要的,这种研究取向鼓励方法的创新,使既有观点的正确性和科学性得到多次证实。即便是常识性的观点,也需要学理的证明,这样的学术努力有其存在的必要性。真理是越辨越明,越证越实。而且,越是常识性的观点,论证起来还越是困难。一加一等于二,是最简单不过的,但是要证明这一点却需要几代科学家的努力。而根据理论思路先找史料然后进行研究,则使观点的创新成为可能,在此情况下,既有的观点和理论可能会得到修正,甚至被颠覆。这样,一种理论的适用性通过中国近代报刊史研究就可能被揭示出来。不论是方法的创新,还是观点的创新,都有利于推动报刊史研究的深化。还需要注意的是,无论是哪种研究取向,学界早已达成的共识即寓论于史、融史于论等原则还是要坚持的,切忌史料的堆砌和理论的说教,将理论和史料割裂开来。

报刊史的研究不应只是将报刊作为史料来利用,还应研究报刊报人自身的历史,特别是要研究报刊自身运行的过程和规律,这是新闻史学科的研究者努力将报刊史划归其学科的边界的重点。但是,报刊史的研究仅仅局限于新闻史学科是不够的,即便是深入研究报刊自身的运行规律,也不能将研究视野限于新闻史学科,而必须拓宽视野,加强跨学科的研究,寻求多学科的合作与融合,以多重视角去推进报刊史研究的深化。而报刊史研究的任务也不再纯粹是探讨报刊自身运行的规律和历史,而是要从报刊去认识整个的社会历史及其变迁规律。因此,拓宽视野,报刊史的内容会变得更加丰富,而报刊史的研究也就更为任重道远了。

每一个致力于报刊史研究的学者,一般来说,都非常清楚自己的理想目标,或所要达到的理想境界。但是,他们也非常清楚,不是每个人都能达到这种理想的目标或理想的境界。因为学者们都是在特定的学术环境中从事研究的,要受到各种条件的限制,这些限制使很多学者只能望着学术研究的理想彼岸而兴叹,有些人则功利地寻求捷径,迎合体制或环境需要的所谓成果由此而涌现。报刊史研究的理论准备和史料积累都是一个长期的过程,理论准备的浅尝辄止,或史料积累的浮光掠影,都不会导致学术力作的出现。在当下的学术评价体制之下,很多学者无奈地选择了这种做法。否则,他们的生存或表面的尊严就受到严峻的挑战。因此,报刊史研究的深化,乃至整个学术事业的发展,都在于学术评价体制的变革,营造良好的学术生态环境,以确保良好学风的形成。在这个条件下,报刊史研究的页面研读和页外解读相结合的方法才会有可靠的机制保障,也才会绽放绚丽的学术之花。

收稿日期 2010—09—10

作者朱从兵,历史学博士,苏州大学社会学院教授。江苏,苏州,215021。